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3年8月30日第21期（增刊1）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二 非 “末代臭老九”的呐喊——《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出版

钱理群 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奚学瑶、张从 韶华如水忆逝年——《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跋

史林一叶

何 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修订版）

文摘

孙怒涛 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414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

【书海泛舟】

“末代臭老九”的呐喊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出版

二 非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系北京大学文革期间在校、之后作为“末代臭老九”发配社会底层的“老五届”青年学子的自述传，由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主编、北大当年十五个系五十多位校友执笔的文集，近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或许是矜持，或许是对中国政治的“成熟”，文革中“老五届”一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沉潜于社会深层之中，不像“老三届”那样痛快淋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历史是不会磨灭的，每一代人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老五届”这一代人告老退休之后，他们便纷纷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告别校园沉入社会后的各种经历，抒发自身的人生感悟，给历史、给子孙们一个交代。北大常为天下先，北大人走出了这一步，不仅仅是代表北大，也是代表着当年被称作“末代臭老九”

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要诉说，他们要呐喊，也告诉后人一个教训：摧残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不可再版。这一代人拒绝遗忘，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部“臭老九”的痛史，便是后人的史鉴。在文革红潮涌动的当今，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愿广大读者读之，思之，并广而告之。

【书海泛舟】

不可遗忘的历史

——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钱理群

按：本篇系钱理群先生为《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所作的序。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

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蓉《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

（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领导者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and 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与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是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

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

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风鸣〉》）。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反而为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是体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韶华如水忆逝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将北大“老五届”学生强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灭知识分子及其应有的精英意识，是历史的反动；但它却用这样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会最底层。这就在北大“老五届”学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橦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上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了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农村教师生涯》），“命运虽然

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1977年11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了《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离开未名湖的日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的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东风好扬帆——记在攀枝花工作过的北大校友》），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意。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这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地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这就会失去了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

击，陷入困境，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們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2013年4月13日——16日

【书海泛舟】

韶华如水忆逝年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跋

奚学瑶 张从

北大“老五届”（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缘际会，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燕园，汇聚在未名湖畔这一方被人们视为圣洁的水土。我们有幸在如梦似幻的湖光塔影里，经历了高雅严谨的学术熏陶、科学与民主精神传统的洗礼。同学们在生命的春天，青春作伴，相携而行，胸怀大志，刻苦攻读，敞开年轻的歌喉，编织浪漫的理想。“一从大地起风雷”，这一切，都被文革彻底改变。北大作为文革群众运动的首难地，在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燕园里再也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当了“兵”，学者成了“牛鬼蛇神”，两派鏖战，四处风烟，从“大批判”到大武斗，数年之间，仇神骤降，兄弟阅墙，恶之魔影笼罩着这座学术圣殿。纵观中国，以至世界的教育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未来的教育界，还能重演这样的魔幻剧吗？！

狡兔死而走狗烹。热潮过后，一度兵戎相见的两大派，终于“大联合”成了“臭老九”。作为原罪者，许多教员被打发到了鄱阳湖里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学生被发配到边远、穷困的社会底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学们望断博雅塔，洒泪告别未名湖，告别书生意气与青春憧憬，成了严酷社会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成了被人冷嘲热讽的没有完成学业的“臭老九”，成了不甘泯于众人而奋发向上、我行我素的另类。从中国最典雅的学府，到了最庸常的社会底层，政治上饱受歧视，专业不对口，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恶劣，既有极左思潮对“臭老九”的政治围困，亦有青春理想与严峻现实的巨大落差，同学们经受着精神与物质双重的心灵煎熬。虽然有极少数不堪忍受折磨而疯癫或自尽，但大多依然秉持着母校赋予的文化自觉与理想坚守，没有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信严冬过后，中国会有一个美好的春天，“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集文章，同学们以自身的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真实而真切地纪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毕业之后的行迹，个中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处处镌刻着

时代的印迹。北大是个大熔炉，她的熏陶洗礼，是我们自觉人生的开始；离开北大，是此种生活的继续，而不是终止。理想愈远大，则与现实的碰撞愈剧烈愈痛苦。北大人多有不趋炎附势的风骨，不同流合污的清高，不随风盲从的独立思考，在各个领域或地区，不仅要站在学术的高地、文化的高地，更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因而，我们的命运，也注定坎坷曲折，与众不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代北大学子可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体性磨难。同学们身处困厄之境，与极左思潮、社会旧习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有的甚至为之身陷囹圄。即使在这个“读书无用论”猖獗的年代，同学们依然刻苦攻读，对科学与人文知识不离不弃。技术物理系1963级的聂永泰同学，不愿虚度年华，不甘平庸，在工作之余从事科学考察，不幸葬身狼腹……在苦难之中，大多同学没有颓伤，而是从苦涩中寻求甘甜，于晦暗中盼望光明，在艰困的生活中寻求欢趣，文章中不时流露“臭老九”式的幽默和苦恼人的微笑。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北大人不但思想活跃，且多才多艺。北大多“奇人”，“老五届”同样如此。本书收录的北大同学的琵琶情缘、习武练舞、骑车游遍全国等篇章，均体现了北大人卓立特行的精神风貌，北大因此而显其“兼容并包”，显其为“大”。书中有许多章节，描述了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在逆境中相濡以沫，互勉互励，让人感动至深。

一朝春雷炸响、拨乱反正，中国大地便万物萌生、气象更新。蛰伏多年的北大“老五届”学子立刻焕发了生机，纷纷突破重围，排除各种藩篱，通过“回炉”、研究生考试、工作调动等多种途径，继续深造，上岗归口，或南来北往，或出国留学，各自勤勉上进，奋发图强。许多人终于成名成家，声名显赫。他们或为学界泰斗，或为政坛领袖，或发明创造，或著书立说，成就了一流的事业，成为人中龙凤。也有不少人远涉重洋，置身海外，依然心系祖国，为中国现代化而出计献策。北大“老五届”人，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毫无愧色地为中国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一个大学的教育声誉与教育地位，最终是以校友的素质和成就作为检验标准，以社会对校友们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识。校友是母校的血脉，是母校的根须，未名湖乳汁哺育了我们，我们最终以自己的成绩反哺母校。尽管我们北大“老五届”这一代人，命蹇时乖，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岗位、自己所处地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无愧于母校的培育，我们无愧于“北大人”的称号。我们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北大教育大厦立体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可以对北大的精神文化、教育理念进行更深入的探知。

告别未名湖，屈指算来，已有四十余年。青春不再，韶华如水，我们这一代人，都已进入老境，静夜沉思，让人不免唏嘘感叹！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同时，我们也在回顾：我们怀念度过生命春天的母校北大，怀念谆谆教诲的师长，怀念亲如手足的同学，怀念未名湖荡漾的碧波，

燕园的红花绿树，以及在其映衬下的激情如火的青春岁月。我们也在思考：何以一夕风雨，北大便成人间地狱，同学老师便成了你争我斗的乌眼鸡？何以这些经过严格考试而精选出来的青年才俊，毕业后飘零四方，成了备受冷落备受欺凌的落汤鸡？这代人可谓在沸水里滚过，在冷水里浸过，在碱水里泡过，从天真、狂热、迷惘而走向理性，走向科学民主、人道人性的康庄大道。这一代青年学子，难道只是北大学子如此？清华、人大、复旦、交大以及其他院校的“末代臭老九”们，不都是大同小异吗？这一代知识分子纷纷的脚步而汇成的历史印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悟，什么样的教训？西南联大的学子，曾因国难而困厄，而我们这代人的苦难，又源自何处？一个国家，将自己最有理想、最富才华的青年才俊，弃之如敝屣，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方针路线值得我们崇尚缅怀吗？但愿我们的遭遇，不在我们子孙身上重演，不再有牛田洋的惨烈，不再有甘孜雪山的哀伤……愿子孙们读到这本书时，那些往事都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感谢互联网，它将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北大“老五届”同窗联系在一起，电邮往来，一起抚今追昔、畅谈时政，品味人生，共享夕照的霞晖。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终将回归自然，隐入历史。当这部书的征集工作行将收官时，不幸传来应征作者中文系 1962 级同学刘蓓蓓病逝的噩耗。当年高考作文为北京考生之冠的才女，悄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一叶落而知秋肃，深秋已然来临，冬日随后将至，一代风流，终将被风吹雨打去。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部集子，也算是我们北大“老五届”学子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一份纪念品吧！

2011 年春天起始，我们通过互联网，开展了《告别未名湖》书稿的征集活动，得到了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的热情响应。同学们惠赐七十多篇来稿，编委会从中选取了 61 篇结集付梓。在征集与编辑过程中，编委会在北大和北戴河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开展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认真地审阅了稿件。征文活动也为校友们搭建了一个友谊的平台，不少海内外同学借此取得联系，互通音问。当年“老五届”的授课教员，后来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老师，一直惦念着遭逢特殊命运的北大“老五届”学生，十分认真地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使我们感到分外亲近。我们也感谢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主任郝斌老师、著名学者钱理群老师出席了编委的北大座谈会，并给我们以具体指导。钱老师还在繁忙之中，为我们文集撰写序言，我们甚感荣幸。我们也感谢前北大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郭建栋同学、北大“老五届”校友陶令煌同学给予的具体帮助，感谢北大杭州校友会、广州校友会、天津校友会、河北校友会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此书的编辑，大体上以作者毕业去向的初始地区或主要工作地域为经，以入学先后为纬。作者来自北大当年 18 个系中的 15 个，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当然，也由于信息所限，许多同学未能知晓并参与此项活动，难免有遗珠之憾。我们的编辑工作，囿于水平，料有错讹，不当处，还望读者直言相告。倘有机会再版，当予补正。

【史林一叶】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修订版）

何 蜀

说明：本文中有关“嚎歌”一节先以《史无前例的〈嚎歌〉》为题发表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随后在《文摘报》（1999年2月28日）、《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1期）、《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月29日）等报刊转载或摘登。全文以《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为题在2000年10月18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235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7期和10月19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23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8期连载；后在《文史精华》2003年第1期发表（有删节）。此后有些网站发表时被乱用了另外的署名或不署名，有的文摘类报刊（如《文学故事报》）从网上下载其中《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流行于文革中的“战歌”》、《文革中歌颂林彪、江青的歌曲》、《文革中的嚎歌》等片断以无署名文章转载（笔者去信说明亦置之不理）；更有个别人将本文部分内容一字不改地整体下载当作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好在目前文革研究尚非显学，这种情况还不多见。

十余年来，笔者不断在对本文进行修订、补充。这是新的修订稿。这次修订中有幸得到北京退休教师马昌海先生（他搜集有数千首老歌音频资料）提供的宝贵意见和一些老歌音频资料，特此致谢！

正当这次修订中，读到李皖著《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三联书店2012年12月版）一书，看到书中第三部分《红太阳（1966—1976）》的最后写有一则附记：“本文中关于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红卫兵歌曲、知青歌、‘移情作用’的素材，基本来自何蜀先生的研究，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一文，引用内容之多，完全可以在作者一栏署上他的大名。特此说明并致谢。”在书的后记中又写有：“特别感谢何蜀先生，关于‘文革’歌曲一段，非常感激也非常惭愧，它基本上是你的研究成果，我只是一个冒名者。”对这位还不认识的60后作者的诚实，我感到欣慰和钦佩，并向这如今已十分稀缺的品质致敬！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诞生了《国际歌》；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犯人中流传过《在荒凉的外贝加尔草原》；在1917年的俄罗斯，《华沙革命歌》在革命者中流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纵队战士用不同语言高唱《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卡秋莎》；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民众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年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前夕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革命派，什么人反革命派，什么人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懂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文艺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

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为“著作歌”了。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语汇而且又长，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真是谈何容易！还有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后人将很难想象当年都被谱曲成为“毛主席语录歌”。

也有最简短的“毛主席语录歌”，如毛泽东在1967年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在什么情况下说了一句无头无尾的“四川很有希望”，就这么六个字，也在成都群众组织的“八二六”派编演的大歌舞《四川很有希望》中，被谱成了序幕开始时的大合唱，就这么一句话翻来覆去唱若干遍。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10月率先发表的前两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等都曾在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过极大的鼓动作用。以至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出现文革时期的场面时总爱用《造反有理》歌作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在红卫兵“破四旧”的1966年8、9月里，这些歌还未诞生。当1968年底大陆各地建立起“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1969年4月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掌权，曾为鼓动群众造反起过作用的那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便“鸟尽弓藏”，从官方传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等新的“毛主席语录歌”。在整个文革进程中，经常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些新出现的“语录”也都被谱成了歌曲。

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这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1967年4月，全国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借题发挥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罪行”。为了配合这一批判热潮，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了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这样的“历史剧”也

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首语录歌（连同剧中的其他 10 首歌）由红卫兵专程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了曲（当时身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遭到一派群众组织批判的李劫夫，已经被另一派群众组织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在人们最熟悉的“毛主席语录歌”中，竟还有一首是由老外谱的曲。那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四面树敌，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文革前关系甚好的亚、非、拉美许多新独立国家也关系恶化，同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邻国关系也一度紧张，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国人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 1966 年 10 月 25 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当时很受群众欢迎。

“语录”毕竟不是都可以谱成歌来唱的。尽管当时幸免于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作曲家和一些业余爱好者费尽心力，勉为其难地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但是真正得到群众认可，广泛传唱的并不多。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彪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 1966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不大好取名字，最后干脆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彪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正如在毛主席语录歌之外还有“毛主席著作歌”一样，在林彪语录歌之外也

有了“林彪著作歌”，那篇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除了开头一段语录“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者……”被谱成了歌曲外，还整篇都被谱成了一首歌来唱，当然其中也有两处大约不大好谱曲的文字是以朗诵来表演的。

在1967年和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些地方还流行过不知谁从林彪的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在1967年5月26日出版的《井冈山之声》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编）第十三期上，也发表了由四川音乐学院井冈山战斗团谱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曲谱前标明歌唱时要“英勇地、前仆后继地”。歌的最后是呼喊“完蛋就完蛋！冲啊！杀！”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四一四”派以后，“四一四”还把这段林彪语录谱曲成为《414战歌》，围绕着这首战歌，不仅清华两派打得不可开交（井冈山兵团一派说这是“四一四”伪造林彪语录，这段话是“联动分子”的“活着干，死了算”反动口号的翻版；“四一四”一派则说井冈山兵团是在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还把好几位中央首长（周恩来、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都牵连进来了，搞出一场轰动一时的闹剧（孙怒涛著《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七章第二十一节“414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573—580页；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第五章第二节“战歌事件”，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258—275页）。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专制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在语录歌高潮中，甚至中央文件里的话也被谱成了歌曲来唱。1967年2月20

日《中共中央给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发出后，其中的主要内容“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也被谱成了歌曲，一些支农部队和红卫兵给农民演唱和教唱。这种“文件语录歌”亦可称歌曲史上一绝。

此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因不是“领袖”，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年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教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

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

虽然“毛主席诗词”没有对文革政治形势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通常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用汽车载尸游行示威。在这样的会上和游行中，还没有流行播放《葬礼进行曲》或《哀乐》的作法（刚刚“破四旧”不久，那些乐曲唱片许多都被砸毁或封存，即使有也不敢轻易使用），“毛主席诗词歌曲”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传说。据长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极左派理论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回忆，当年与他在长沙同狱的一位“联动分子”程德明告诉他，程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友（“联动分子”）在1967年2月底来信说，毛泽东已下令将全部被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杨小凯《联动分子》，《中国之春》第九十八期）因为这首歌是毛泽东怀念前妻杨开慧的。不过，对这一传说，文革后公开发表的一些“联动”成员的有关回忆均未提及，而只说到他们当时如何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况且释放“联动分子”也不是在“2月底”而是在4月下旬。

《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当时奉命“支左”的解放军部队也常遇到这样的窘境：因为要到某一派群众组织驻地去强行办理如搜缴武器之类事情而被阻于屋外时，该群众组织也会在高音喇叭中播放这首歌，照样唱“敌军围困万千重”。解放军战士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当时群众爱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有的还编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调优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造反派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知道这是毛泽东为江青所摄照片题的诗。而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中共高层领导内经常以“为造反派说话”的姿态出现，被造反派视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欢这首歌，则是因为诗句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毛泽东诗词歌曲还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了。当时许多干部在“五七干校”中既被监督劳动又挨批斗折磨，对主管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是敢怒而不敢言。据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回忆，1973年军宣队撤离他们那个五七

干校时，一位搞美术的“五七战士”唱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恍然大悟：这首诗名叫《送瘟神》。（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149 页）

出自民间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全面展开的 1966 年 6、7 月间，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作曲家们迅速行动起来，谱写了一首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然，除了极少数几个作曲家或工农兵业余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只作为“集体创作”，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集体创作”、“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集体创作”等。自从 8 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势逐渐失控，原有的专业作曲家一批批被当作“反动权威”、“黑线人物”打倒。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地掀起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从这时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传媒中，除去“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和一些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之外，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创作歌曲了。在这一段一方面是极端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空白时期，在群众中便流行开了许多造反派自行创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也最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的（据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20 页）《革命造反歌》。歌词共有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1966 年 8 月 6 日，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应邀到会的江青在讲话中，提到造反歌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诗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负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一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西南革命造反派编 158 页）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在事后新华社于 21 日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中，有这样几句话：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这大概是官方传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这首歌却未能在官方传媒中发表和播放，不过，因其旋律简朴、节奏明快，歌词大致能表达初期一部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因此仍然不胫而走，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为初期各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笔者当年曾见到红卫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传单上署名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笔者闻知彭小蒙大名即始于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红旗的名气所致（当时是不会有“版权”之争的）。北大附中红旗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都以“高干子女”为首，因家庭背景的关系能得风气之先，只是他们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而打击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当时所听从、所保卫的“党中央”，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内的中共中央集体。后来这些高干子女成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成员，被打成“反革命”，也尝到了被专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随着“联动”的被批判，加上歌词中的“血统论”意味，逐渐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这首歌了。

1971年8月10日，周恩来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用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474页）这个在唱歌中高喊“杀杀杀”口号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另一首较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见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阶段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个版本的《鬼见愁》，是以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主题创作的。这副对联出现于1966年7月底，大约8月上、中旬被编成歌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现有不同说法，一个是当时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一学生申晓辉在《文革日记》中8月17日的记载：“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175页）另一个是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当时是“老红卫兵”骨干）的回忆：“这首著名的红卫兵‘战歌’就是我谱写的。……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

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刘辉宣《昨夜星辰昨夜风》，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4月，53—63页）同是四中学生的唐晓峰则说“《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他在回忆文中还附上了此歌的曲谱（同上第396页）。

后因“血统论”露骨地“违反毛泽东思想”（其实“血统论”早就被秦末农民领袖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否定），也得罪了广大的普通群众（特别是人数不少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联动”对联不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众的鄙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中批判了这幅对联。造反派便将这首歌改了歌词，有了后一个版本，歌词改为：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唱完后通常还要高呼几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有的还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把他脑袋（或称“狗头”）砸个稀巴烂！”一类口号。这个新版的《鬼见愁》，成了一首典型的造反派歌曲。流行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众性造反高潮时期。其不同于《革命造反歌》的重要特点是，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种高干子弟引为自豪的“血统论”（“革命后代举红旗”、“党是我们亲爹娘”）的痕迹。因而更为许多没有“好出身”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背上黑锅、受到株连，长期遭受歧视甚至迫害的群众所欢迎。1966年底，正在领导开展四川“石油大会战”的会战指挥部机关驻地威远红村，来了第一支职工造反队，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因造反队负责人之父是已被打倒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官办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便在会场周围起哄，叫喊：“狗崽子滚出去！”造反派则理直气壮唱起这首新版《鬼见愁》，这令人耳目一新的歌声使赤卫队哑口无言败下阵去。

至于歌中骂人的话，则是从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那里学来的。因为“老”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女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军队将领）不但平时爱“骂娘”，就是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也会“骂娘”。为了表明自己是血统纯正的“革命后代”，他们便不仅穿上父辈的旧军装，还学着像父辈那样“骂娘”（连女孩子都如此）。尽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对红卫兵讲话中多次劝告他们不要骂人，但因这一不良现象已被当成了“革命血统”的标志，所以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还“普及”到了后来的造反派当中，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另有一首造反派歌曲更进一步骂道：“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

继造反歌之后出现了慷慨激昂的群众组织战歌。

自近代以来，一些宗教团体为了使信徒们产生认同感，常运用节日、圣人崇

拜、历史诠释、定期集会及音乐、绘画等手段来增加凝聚力。在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音乐、绘画，都已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中也能看到。从1966年底到1968年夏群众造反运动的鼎盛时期，许多群众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团体或自己这一派的“战歌”，以及歌颂自己的造反纪念日（自定的“节日”）或“战斗历程”（作出“历史诠释”）的颂歌。

当时最为走红的“革命作曲家”李劫夫就曾应邀为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谱曲，歌词是“卫东红卫兵”所作，颇有代表性：

红旗飘飘，炮声隆隆，文化革命战火红。卫东战士迈大步，行进在革命的行列中。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的红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二段前四句与第一段相同，后四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奔向那共产主义锦绣前程。为了把革命大旗插遍天下，红卫兵永远跟着毛泽东！”

在1967年1月夺权之前，重庆的造反派尚未分裂为两大派，统称为八一五派，当时曾流行过一首《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由“中央音乐学院赴川革命串联队”集体创作，歌词是：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的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敢造反，敢革命，革命到底不回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有的群众组织虽然没有专门创作的战歌，但是经常在广播中播放和在集会上齐唱一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自己组织意愿或感情的歌曲，可以视为他们的“代战歌”。如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经常广播文革前的一首表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歌颂毛泽东的流行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歌词是：

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订，丰产的道路细指引。

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关心社员衣食住，问寒问暖问辛苦。主席就像红太阳，照在身上暖在心。

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领导咱们来办社，人人干劲添十分。大办农业齐发奋，人民公社万年春。

以彼“社”（农村人民公社）代此“社”（新北大公社），试图以毛泽东是“新北大公社”的人这一虚幻意愿来自慰和打击对方。另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经常广播那首“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以示自己一派虽属少数，但却有如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而对方尽管人多势众，也只是反动的“敌军”。清华大学的两大派中，井冈山兵团属掌权的多数派，自然不必以这首“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歌来鼓舞士气，有人便创作了一首《井冈山战歌》，

歌词为：

井冈山是造反的山，井冈山人是造反的英雄汉。舍得一身剐，敢闯阎王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井冈山人是红色的英雄汉。忠于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创建红色新江山。

但是这首歌并未得到“井冈山战士”认同，因而也未能作为“战歌”流行（近年老校友聚会时还有人把“井冈山是造反的山”唱成“井冈山是老蒯的山”来取乐）。清华大学另一派“四一四”的战歌则是前述那首俗称《完蛋歌》的“林彪语录歌”。以这段林彪语录谱成的歌，当时在各地有多种版本。但像清华大学“四一四”这样把它作为自己“战歌”的，似乎只此一家。

1967年夏秋之际，各地造反派两大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因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公开讲话肯定“文攻武卫”口号，所以武斗在“武卫”的旗号下变成了正义之举。于是也就有了理直气壮歌颂武斗的歌曲。在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艺战线》第26号合刊版上就载有一首《文攻武卫之歌》，由江苏文总省锡红反团与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新上音》《革命楼》红卫兵创作，歌词有两段，第一段是：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
江青同志号召我们文攻武卫，我们再也不能天真烂漫。
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
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

歌词第二段只有“江青同志……”一句改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其他与第一段同。

当时重庆两大派以大型兵工企业生产的援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各自抢占制高点，坦克上街，“舰队”巡江，展开了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武斗中，反到底派的重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下属有一些普通中学和中专学校学生组成的武斗组织冲杀在第一线，伤亡惨重。九一纵队的重要成员电力学校东方红创作了一首《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战歌》：

炮声隆，枪声激，风烟滚卷战旗。
啊，“九一”战士浴血奋战，所向披靡全无敌！
烈士血，染红旗，流血牺牲志不移。
“九一”战士心向党，誓死保卫毛主席！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踏着烈士的血迹勇敢前进！
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前进！

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九一纵队”誓与牛鬼蛇神狐群狗党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年重庆大武斗中与反到底派厮杀的八一五派中学生组织里，有名的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无产者战斗队也有自己的战歌，作者是其主要负责人胡明富（西师附中高六七级二班学生），他在1967年8月4日率队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845厂（炸药雷管厂）时中弹身亡。他创作的《无产者战歌》歌词为：

我属无产，名为钢铁。
组织如钢，纪律似铁。
一举一动，从不乱越。
对己对彼，都要严格。
革命途中，不停不歇。
革命后代，誓作钢铁！

在重庆南岸黄山上原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官邸，50年代改建为干部疗养院，1967年夏则被反到底派武斗组织占据作为据点，建立了所谓“黄山警备区”。对此武斗据点居然也有自编歌曲《黄山是个好地方》，歌词为：

都爱黄山好风光，我爱黄山是战场。山下长江炮声响，山上松林红旗扬。
站在山顶放眼望，五湖四海胸中装。毛主席光辉思想来武装，文攻武卫握紧枪，文攻武卫握紧枪！

黄山是个好地方，反到底战士聚一堂。颗颗红心向着党，我为毛主席来站岗。练兵能吃千般苦，下田收割丰收粮。革命的大旗高高举，红色江山万年长，红色江山万年长！

歌中唱的“山下长江炮声响”，即指当时反到底派以三艘改装“炮艇”组成的“舰队”溯江而上与八一五派在江岸上的几处武斗据点展开激战。时光流逝。不仅后人将不会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的“战歌”，就连当年的造反派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这类歌曲了。

稍晚于“战歌”，出现了“史诗”型的造反历程颂歌。

由于受到文革前《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影响，在1967至1968年间，造反派组织自己编演的“史诗”型大歌舞一时成为风气。

首都中学红卫兵“四三”派于1967年初夏编演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京公演达101场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观看了演出。7月1日，该剧进入广播剧场摄像，由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剧中的创作歌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38页）这可能要算是在官方传媒中“露脸”的极个别的造反派创作歌曲之一。此歌发表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海淀、西城委员会主办的《中学红卫兵》报第五期（1967年6月11日出版）上，歌词是：

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风再大，浪再险，我们和中央文革肩并肩。
洒热血，心甘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炮声隆隆，吼声震天，文化革命掀起狂涛巨澜。

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坚决把刘邓彻底砸烂彻底砸烂彻底砸烂！
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当时还有另一首同题歌曲，是四川著名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创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七场《四川很有希望》中的一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歌词为：

巴山蜀水连北京，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志擎大旗。红卫兵战士永作您忠实的红小兵！风险大，浪连天，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也心甘！山连水，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紧跟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永向前！红卫兵战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变！

在 1967 年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战歌演出办公室编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红卫兵战歌》中，有另一首内容相似的歌曲《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歌词为：

像海边的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松无比勇敢坚强，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实助手，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英雄的红卫兵革命意志坚，心红甘愿排除万难。大风浪里跟着您，海枯石烂心不变。誓做您的铁拳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敬爱的中央文革啊，我们永远跟您心相连！我们永远跟您胜利向前，胜利向前！

当时首都红卫兵不仅编演了根据文革前萧华作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原曲重新填词的《红卫兵组歌》，另外还创作了一个仿照《长征组歌》体例，词、曲均由红卫兵另行创作的《红卫兵组歌》，由首都红卫兵展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 4525 部队、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天津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团集体创作。包括《革命烈火连天烧》、《白色恐怖奈我何》、《心中想念毛泽东》、《难忘的八月十八那一天》、《煽风点火革命大串连》、《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等十二首歌曲组成。歌词都很有时代特色。如《革命烈火连天烧》：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革命的烈火连天烧，连天烧！
从渤海湾到戈壁滩，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斗争的火焰万丈高，万丈高！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吹响了文化革命进军号！
拿起笔，作刀枪，意气风发胆气豪！
风在啸，山在摇，革命造反杀声高！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卷起红色大风暴！
把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把修正主义连根拔掉！
瞄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开炮！开炮！
……

群众组织编演大型歌舞之风刮遍各地。有的地方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又各编各的。如四川成都的两大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编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为首的八二六派则编演《四川很有希望》（参演人员包括四川省歌舞团、四川音乐学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成都市歌舞团、成都市川剧团、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成都铁路局文工团等几十个单位的 400 多人）。由于当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领导人的派性倾向，八二六派的《四川很有希望》被指定作为向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献礼演出，于 1968 年 3 月至 7 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于 5 月 31 日成立）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编排和上演。这台大歌舞共分六幕：《造反有理》、《一月风暴》、《风雪迎春》、《伟大的长城》、《为红色政权而战》、《革命委员会好》。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人民广播电台都录制和播出了整台节目中的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全剧的主题曲和第六幕《革命委员会好》中的几首歌曲，峨眉电影制片厂为其中的精彩片断摄制了纪录片（曲清荣《〈四川很有希望〉的创作和演出过程》，张家钊、张麒采访整理《大型歌舞剧——〈四川很有希望〉》，载《当代史资料》2012 年第 2 期，总 46 期）。

但是，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众组织自己的“战歌”，多因其严重的标语口号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碍，大多没有得到流传。

在大歌舞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个并非歌颂造反派的造反历程，而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表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曾在 1967 年至 1968 年间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其中第四场《红色政权》中的《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第七场《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楼的灯光》等歌曲，因艺术水平较高，曲调优美抒情，同时又没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传唱一时，颇为流行（笔者在文革结束 30 多年后还在重庆街头听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两歌乐曲）。

造反派歌曲中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为“林彪语录”谱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词”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年却是颇为严肃地流行过一时的。例如，在 1966 年 12 月 4 日重庆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会场造反，与正在集会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流血事件后，在混乱中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一些造反派从火葬场强行拉走几具尸体，认定为“造反烈士”，陈尸展览，大造舆论。重庆市歌舞剧团的造反派、独唱演员李天鑫（后为重庆反

到底派文艺界延安兵团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特地为此创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此歌共有三段，歌词为：

1、唱起那造反歌想起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面对邪恶敢于斗争，你站在毛主席像前传播真理。

(副歌)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的青春夺去。亲爱的战友，你永远活在活在我们心里！

2、提笔写大字报想起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会场上你高喊八一五好，万人丛中你挥舞战旗，你眼看着战友在血泊中倒下去，你冲向大会主席团造反有理。

(副歌同上，略)

3、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小闯将活跃在山城里。会场上你呼口号最有力。魔鬼抓住你乱踢乱打，你面对着死亡不把头低。

(副歌同上，略)

因其曲调哀婉抒情，一时间到处传唱。但当有关“烈士”的传言被证实是无中生有，抢来的“烈士尸体”中还有“劳改犯”以后，这首歌也就销声匿迹了。不过据说流传到外地后，曾一度成为某些地方为武斗中的“烈士”召开追悼会时的悼歌之一。

后来大规模武斗中不断死人，一些地方也创作了歌颂各自“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碍和一般群众对武斗的反感，这类歌曲多半只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少数人中传唱，难以流行。

从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刻影响。红卫兵、造反派大多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对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牺牲的英雄壮举的追求。只可惜他们像堂·吉珂德一样登错了舞台。

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听说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

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禹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禹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收获》1997年第3期）

著名演员新风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风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作家文摘》106期）

当时是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分管“牛鬼蛇神劳改队”的红卫兵头头刘东，在《亲历者的见证》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关于《嚎歌》的回忆：

说起《嚎歌》，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革命小将们的创造，成为“牛鬼蛇神”每天必唱的歌儿。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北京四中“八四”事件后不久，有一天我刚踏进小食堂，就听见一阵类似号叫的歌声。只见“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面对挂在墙上的一纸曲谱，由一位音乐教师教唱，教一句学一句。那位老师手持小木棍，不时提醒大家，必须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在座的“牛鬼蛇神”中，有的表情麻木，有的神色恍惚，但有的居然摇头晃脑，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周围站满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

学得最快的是刘铁岭副校长。他平时就爱歌唱，“文革”前，他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大家高歌一曲。谁也没想到，刘校长的爱好在“劳改队”派上用场。老师没教几遍，他就会唱了。于是自告奋勇为大家做示范，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歌声既嘹亮又有节奏感。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似乎在证实自我赎罪的真诚与信心。而学唱《嚎歌》最不合格的是杨滨，她天生五音不全，唱来唱去总跑调儿，与其说唱歌，倒有点像在念经。

从这一天起，《嚎歌》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任何一名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令其唱《嚎歌》取乐。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此提出异议，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时至今日，有时我闭上眼，就会浮现学唱《嚎歌》那一幕，还有那像哭一样的歌声。（《暴风雨的记忆》190—191页）

同是北京四中学生的印红标则记叙了当年红卫兵教唱《嚎歌》的另一细节：“第一句是‘我是牛鬼蛇神……’红卫兵教唱：‘你是牛鬼蛇神’，学的人要唱：‘我是牛鬼蛇神’，无奈其中每句都有‘你’和‘我’的转换，心力交瘁的老师一不小心就会跟着唱成‘你是牛鬼蛇神’，少不了招致斥责和拳头。”（《暴风雨的

记忆》278页)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99页）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王友琴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说：“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5页）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却有另一个说法，他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说：“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不能忘却的纪念》，载《荒煤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2页）

周巍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如果陈荒煤的回忆无误，那么这种强迫一个老干部、老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不过，一个老作曲家会这样做吗？周巍峙的儿子周七月感到怀疑，并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考证，他从他父亲周巍峙的日记中查到，他父亲是在1966年“八一八”之后才被通知进文化部“大庙牛棚”的，而在那之前《嚎歌》已经流行，显然就不可能是周巍峙在文化部“大庙牛棚”里才奉命创作的了。周七月回忆：“我父亲关于《嚎歌》的记忆是这样的：有一天，部里的造反派和外单位的人来到牛棚，给我一张纸，让我教大家唱‘牛鬼蛇神歌’，因为牛棚里关了那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人懂音乐……”（周七月《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载 photo.blog.sina.com.cn/julydesigner , www.july-chow.com 周七月博客）周巍峙的这个回忆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教唱”后来被误传成了“创作”。只是其中提到的“部里的造反派”一说不大准确，因为在1966年8月6日文化部文革小组才决定从各单位逐步撤出工作队，撤出前建立临时党委、院（团、社、厂）务委员会，并由领导提名成立革委会，工作队撤离后仍留驻个别“联络员”“听取群众意见”。此后，文化部所属大多数单位原工作队负责人（多为军人）进入领导班子成为“代职干部”。8月7日，文化部召开“黑帮”集训班全体大会，文化部

代理部长、党委书记萧望东讲话称“不彻底清除黑线不收兵”。直到9月8日，在文化部所属单位任“代职干部”、“联络员”的军人们才撤离。10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部分学生到文化部“造反”，批判部党委和部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9日，文化部机关贴出第一张批判文化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大字报。（《建国以来文化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纪要（1949—1967）》初稿，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印，1967年6月）因此，在周巍峙所说的那个时候，文化部的“牛棚”实际上还是在部党委和部文革小组的掌控之下，造反派尚未出现，来指令他教唱《嚎歌》的应该不是造反派而是部党委和部文革小组手下的“左派”。

周七月还在文章里提到了有关《嚎歌》曲作者的另一种说法，是刘辉宣（即后来写了著名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家礼平）告诉他的：“那时他是北京四中老兵合唱团的。先唱《长征组歌》，后来又筹备唱《红卫兵组歌》。这个《红卫兵组歌》的曲子很拗口，不好听，也不好唱。刘辉宣就问是谁写的，这么难听。一个同学答，是北海中学的音乐老师谱的曲……这位同学还补充说，《嚎歌》的曲子也是他写的。”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

歌词有两段：

八月十八日

（下面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歌。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唱不好这支歌，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单独唱仍唱不好，强迫她抄在“改造日记”上天天唱。——编者）

2/4 牛鬼蛇神嚎丧歌
哭丧地

1 5 | 1 1 5 i | 5 0 | 5 i | 5 3 2 1 | 2 2 0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是牛鬼蛇神 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1 7 1 | 2 1 * 2 | 5 * 4 5 i | 5 - | 2 2 i i | 2 i | 7 - |

我有罪 我该死 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待
我有罪 我改造 我改造 不老实 交

2 5 * 4 | 5 0 | 2 2 5 | 1 0 ||

砸烂砸碎 砸烂砸碎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350页）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

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了这样的说明：

下面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歌。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唱不好这支歌，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单独唱仍唱不好，强迫她抄在“改造日记”上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 8 月 1 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 8 月 3 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肯定而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

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大量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 月底、8 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 1966 年 8 月 20 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 16 期，1967 年 1 月 18 日第四版）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

显然，这首《嚎歌》是文革初期局势还在各级党政领导控制时的产物。其“版权”不应属于后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在中共历史上，像这样由当权者授意炮制一首专供“革命对象”认罪悔罪唱的歌，是有先例的。

在那场同样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失足者”阶段，大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追求革命的青年被打成“特务”，据当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受训后在西北党校任教的四川地下党干部张宣回忆，他因拒绝承认是“特务”，被逮捕关押到了延安西岭凤凰山的边区保安处监狱，从 1944 年开始，保安处为配合边区的“文化运动”，也为让在押人员中的某些人才替活跃机关文娱生活效力，在看守所成立了秧歌队，又叫文工队、宣传队，队员（即被打成“特务”的“在押人”）中有作家王宗元、柳风、

袁静（女），诗人袁血卒，作曲家梁寒光，舞蹈家胡沙，导演晏甬等。张宣回忆：

我们的作曲家梁寒光，奉命创作一首非常斗争性、政治性、进行曲式的歌子，歌词是由王宗元、袁血卒授命领衔，在押人集体写作，经过审查批准，定名为《在押人之歌》。有的人建议改为《凤凰山之歌》，意思是一样的。我凭记忆（这个记忆完全准确），抄出这首歌的词、曲如图。

集体创作时我也在座，有的字眼经过反复推敲，以求切合“特务”、“在押人”身份。例如初稿里的“黑夜里迎着太阳”，这个“迎”字就不妥，因为它含着主动向前去的意思。改成“逢”就好了，说明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被动地受到了“抢救”。应该说，这首歌的词曲，在为现实政治服务上是很不错的。它把一大群蒙冤负屈、饮恨度日的人，刻画得像是真正在那里弃旧图新，而且悔罪心切。歌子经上级批准，由梁寒光给大家教唱。但在押人并不喜欢这个歌，学唱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终于没有如原先计划的，由这些人“向领导献歌”。人们说：我们是被“太阳”赶进黑夜的；我们没有胜利，没有欢歌，我们从未跳进法西斯陷阱，怎么能从里面“跳出”来？我们多少年走的就是抗日救国的共产主义方向，谁能叫我们改踏什么“新的方向”，追求什么“新生”？至于“跟着共产党”，更是说不通。我们就是共产党，还能跟着谁？……总之，歌词被群众否定了，没有人唱了。像我这样欣赏并牢记这首歌至今五十多年不忘的人，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凤凰山之歌
集体词 梁寒光曲

5 5 | 5 3 1 7 1 | 2 7 5 0 3 | 5 6 5 5 1 3 | 1 5 - - |
我们胜利我们歌唱，在黑夜里逢着太阳。

5 6 5 3 3 5 5 0 | 5 5 1 2 3 1 0 | 5 6 5 5 6 5 4 | 3 3 3 2 4 |
跳出法西斯陷阱，踏上新的方向，看，毛泽东的旗帜（啊）辉

3 5 4 3 - | 2 2 2 2 5 2 | 1 1 1 6 5 5 | 2 3 2 1 2 3 2 1 |
煌辉煌。响应他的号召，切实改造思想，积极生产，认真学习，

3 2 1 7 6 | 5 3 1 0 3 3 | 5 5 1 5 1 5 5 | 0 5 5 1 5 1 2 3 5 |
充实新生的力量。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

5 6 5 4 3 4 3 | 2 2 2 2 5 2 | 5 - - 0 3 3 | 5 5 1 5 1 5 5 |
坚决跟着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我们前进前进前进，

0 5 5 1 5 1 2 3 5 | 5 6 5 4 3 4 3 | 2 2 2 2 5 5 | 1 - - 0 |
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张宣老人回忆写出的这首歌的歌词是：

我们胜利，我们歌唱，在黑夜里逢着太阳。跳出法西斯陷阱，踏上新的方向。看，毛泽东的旗帜（啊）辉煌辉煌。响应他的号召，切实改造思想。积极生产，认真学习，充实新生的力量。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坚决跟着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张宣《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4期）

因被专政的“在押人”都不愿唱，这首歌未能流行，其影响自然就大大不如后来的《嚎歌》了。值得探讨的倒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凤凰山之歌》（在押人之歌）只有“跳出法西斯陷阱”、“切实改造思想”这样含蓄的认罪词句，那些

“在押人”都拒绝唱，为什么文革中那首充斥着大量自贬自辱性词句的《嚎歌》，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们却未见有人拒绝唱，而且有的还唱得那样认真投入？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由当地革命委员会（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已于这年7月成立）组织的专政队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专政队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当地革命委员会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中央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还有一点特别之处是，在中学教材中的这首歌，居然也像当时街头的大字报大标语把打倒对象的名字倒着写那样，把歌词中刘少奇名字的“少”字都顺时针90度倒下来排印。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1=C $\frac{2}{4}$

稍快 无比愤恨地

($\dot{1}$ · 5	$\dot{2}$ · 5	6·5 3 5	$\dot{1}$ 2 3 0	$\dot{2}$ · $\dot{1}$ $\dot{2}$ $\dot{2}$
$\dot{1}$ 0	$\dot{1}$ 5	6 $\dot{1}$ 6 5	3·2 3 5	6 0
2 2	$\dot{1}$ 3 $\dot{2}$ $\dot{1}$	6·5 6 $\dot{1}$	2 0	$\dot{1}$ · $\dot{2}$
3 —	$\dot{2}$ $\dot{1}$	$\dot{2}$ 6	3 · 5	6 —
> 5	> 3	> 2 > 3	$\dot{1}$ · $\dot{1}$ $\dot{1}$	6· $\dot{1}$ 6 6
3 0	1 · 2	3 5	6·6 $\dot{2}$	$\dot{2}$ —
$\dot{1}$ · $\dot{1}$ $\dot{1}$ 2	3 2 3	($\dot{1}$ · $\dot{1}$ $\dot{1}$ 2)	3 2 3 0	6·6 6 $\dot{1}$
6 5 6	(6·6 6 $\dot{1}$)	6 5 6 0	$\dot{1}$ · 6	5 3
$\dot{1}$ 2	3 $\dot{1}$ 6	5·5 6 $\dot{1}$	2 5	$\dot{2}$ $\dot{2}$
> $\dot{1}$	0	x · x · x · x	x —	x —
x x	x x x	x · x · x · x	x 0	

· 70 ·

把歌词中刘少奇名字的“少”字都顺时针90度倒下来排印。（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重庆市中

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1969年9月)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或曰“中国特色”吧。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教材,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之前,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就已经非常多,从少年儿童歌曲中的“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工人歌曲中的“跟着毛泽东我们向前走”(希扬作词,瞿维作曲的《工人阶级硬骨头》),农民歌曲中的“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张永枚、王丹作词,程恺作曲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战士歌曲中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李之金词曲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等等等。“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胡松华作词并演唱的那首《赞歌》里最先唱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因此在文革初期即有歌特地唱道:“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晨耕作词、田光作曲《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70页)。后来有人又提出在

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325 页）但在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 7 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 1944 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巴金《解剖自己》，载《随想录》，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466—467 页）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 1965 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文革初期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了有关这首歌的一件事。1967 年 1 月，中央办公厅“红色造反团”在汪东兴支持下宣布夺了童小鹏的权，10 月，童小鹏被送进汪东兴办的学习班。“汪东兴搞这个‘学习班’，就是组织一批‘造反派’对‘杨家死党’（他们把同杨尚昆关系密切的人都打成‘杨家死党’）及‘走资派’、‘特务嫌疑’，实行非法的‘专政’。有一次，‘学习班’的领导人召开大会，未经法律手续，居然宣布中办俄文翻译阎明复是里通外国的‘杨家死党分子’，当场逮捕。当大会结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时，居然宣布‘杨家死党’的人不能唱。我自认不是‘杨家死党’，跟着唱，遭到‘造反团’的人的批评。我当然不服，提出了抗议。”（《童小鹏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 548 页）能不能唱这首歌竟成了一种政治权利。这也算得上是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吧。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

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

（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版 27 页）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 年 9 月 12 日，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 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622 页）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 60 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 1965 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 13 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因与黄永胜的家庭关系（黄永胜的三儿子曾在李劫夫任院长的沈阳音乐学院读书时住宿于李劫夫家并认他为干爹），加上又为“林彪语录”谱了歌曲，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 65 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
一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
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
一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
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由年轻的蒙古族作曲家阿拉腾奥勒（1968年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1971年从河北省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的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曲调具有蒙古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有意思的是，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十分荒唐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甸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沙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

真是咄咄怪事。”（周立华《时乐濛夫妇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期）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演唱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组歌七首歌曲之一，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了，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除了“以林副统帅为榜样”的歌以外，还有一首“以林副主席为榜样”的歌，歌词是：

**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
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
拥护毛主席就是革命，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
歌唱毛主席就是幸福，忠于毛主席就是最大最大的革命大业。
永远忠于毛主席（呼：永远忠于毛主席！）
无限忠于毛主席（呼：无限忠于毛主席！）
天变地变心不变，山移海移志不移！**

当年还有一首本来是歌颂毛泽东的歌，因为其中捎带也歌颂了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之后遭到查禁，这首歌叫《幸福喜讯传海疆》，是电影纪录片《大海航行靠舵手》中的插曲，两段歌词是：

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

幸福的喜讯传遍了万里海疆
战士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颗颗红心像葵花朵朵开放，朵朵开放
毛主席啊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的精力这样充沛
您的身体这样健康
三山五岭纵情欢呼
五湖四海同声歌唱
敬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
幸福的喜讯传遍了万里海疆
海军战士向您宣誓，向您宣誓
钢铁的誓言在海上回响，在海上回响
毛主席啊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生为您战斗死为您献身
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
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革命路线
永远忠于您光辉的思想

仅仅因为第二段歌词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这一句，这首歌就在 1971 年“九一三”之后一下子由红变黑，从此不能再唱。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 1967 年 5 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官方传媒于 5 月 10 日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 年 7 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 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又称“新三军”）造反精神强，对许多军队领导人都提出要批判、打倒，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又叫“老三军”）则对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等军队领导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这些领导人支持。这一派事先通过其能够“通天”的成员（经常应召陪毛泽东跳舞的演员）将演出打算向毛泽东提起，毛泽东叫她们找林彪，叶群得知后表示支持，于是该派不顾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月13日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事件史称“五一三事件”。

事发后，鉴于毛泽东和林彪的态度，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周恩来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年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为“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演出内容分两个部分：一、欢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武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赵世民《〈东方红〉的来龙去脉》，《作家文摘》54期）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年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40—41页）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在1967年4月，当那场由毛泽东亲自审定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和《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及一系列宣传鼓动掀起的“镇反”运动肆虐一个多月后，又被惯于翻云覆雨的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之名加以否定。曾在“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重新开始“战斗”，在其所办的小报《八二六炮声》第6号（4月14日出版）上，用二、三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化名项楚写的书信体长文《乐在天涯战恶风——寄自巴山蜀水》，介绍八二六派在“镇反”中的“英勇事迹”，其中就记叙了八二六派成员在“白色恐怖”中唱《远飞的大雁》这一情节：

在宿舍，在校园，甚至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见大中小8.26战士歌唱着自己编写的曲子：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8.26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

这是8.26战士的心声啊！无论在以后什么时候，8.26战士将永远不会忘记在那白色恐怖的蓉城二月，在想念毛主席都有罪的黑暗日子里，自己所唱的深情的歌曲！

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宣泄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谢明作词，庄映作曲）：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刚，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年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还有一种即兴“创作”的重新填词歌曲，就是一般人想不到的了。在1967年7、8月间重庆大规模武斗中，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抓到对方的俘虏后都有过杀俘、虐俘的恶行。笔者当年曾听一个反到底派的中学生津津乐道地讲他们的一次虐俘行为。当时双方在虐俘时有一个取乐的“保留节目”：逼迫俘虏跳《车水忙》（当年文艺宣传队的一个流行节目，演出者边唱“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洋洋……”边两脚轮番跳动做踩踏水车状），不跳的，或者说跳不来的，就用棍子打脚，逼得其非跳不可。那一次八一五派的俘虏中有一人是跛脚残疾人，“自报节目”说腿脚不方便不好跳，唱一个歌给你们听要不要得？获准后，那跛脚俘虏便临时根据文革前的流行歌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编了个讨好的歌曲《反到底人民要解放》唱起来。《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原是胡松华作词，乌斯满江作

曲的歌，文革前广为流行，其第一段及副歌歌词是：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反帝怒火高万丈，
再不能忍受压迫当奴隶，誓把帝国主义强盗统统埋葬。
从古巴到几内亚，从安哥拉到越南南方，
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烧得帝国主义心发慌！

而那个俘虏即兴改唱的歌词则成了：

反到底人民要解放，革命烈火高万丈，
再不能忍受压迫当反革命，誓把革联会强盗统统埋葬。
从军工井冈山到西师八三一，从造反军到财贸九二一，
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烧得那个伪革联心发慌！

当时重庆两派争执的焦点就是“一月夺权”时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反到底派认定那是“假夺权”，革联会“镇压造反派”，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并称之为“伪革联”。那位残疾俘虏新改的歌词里把反到底派的知名组织都编了进去，于是得到赞赏，免遭“触及皮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制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面”，“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面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面的反差更加强了。“学了就要用”则改成了“吃了就要吐”。（《血色黄昏》，新星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286 页）

1968 年底全国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郑南作词，晨耕作曲），

歌有四段，一二段歌词为：

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哟嗨嗨。

班长划船我掌舵，船上满载丰收果。流水急来浪头大，多亏了班长的粗胳膊，哎哎嗨嗨，碾碎那急浪走清波。哟嗨嗨……

在川东彭水插队的重庆知青将词改为：

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

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

“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的流行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深感失落的知青以这样的歌来宣泄苦闷和自娱自慰。还有知青把5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袁水拍词，瞿希贤曲）拿来重新填词，头一段是：

（原词）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多装快跑快跑多装，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给农庄。

（改词）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满载着知青去下乡，满载着知青去下乡。我们要和转哥对调，把转哥调到农村，把知青调到工厂。

“转哥”是当时一些地方对复员转业军人的戏称，更轻蔑的称呼是“转转儿”（后一“转”字读儿化音）。因知青大批下乡时，许多复员转业军人却到城市安置（有的参军前本是农村户口），普遍安排到国营企事业单位并得到重用（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多成为专案组成员或“群众专政”的打手），有的嫌安置不如意的还联合起来到革委会去闹事。这自然使知青们在对比之下大感失落，大为愤懑。

从1968年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版531页）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249、250页）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

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前些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作了“技术处理”，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年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3月5日，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年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

些“新词”了。笔者当年在工厂的车间里曾奉命教唱新《国歌》，教唱之后也没有谁再唱它，要不是在写此文时查资料，我也记不起那些新填的歌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文汇报》1998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176页）

人们也许想不到，有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还成了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武斗动员令。重庆市第六中学的著名造反派红卫兵组织32111战斗团，是重庆八一五派的中坚，在与反到底派的武斗中声名远扬，被反到底派讥称为“咪咪多多多

（将“32111”按音乐简谱读音）小联动”。当时许多造反派的武斗组织将《骑兵进行曲》作为武斗的动员令，以此曲通知武斗人员集合。而重庆六中 32111 战斗团却别出心裁，将阿尔巴尼亚歌曲《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用作武斗动员令，该战斗团的武斗人员一旦听到学校广播中突然响起“在田野在工厂在工地上，劳动歌声嘹亮……”的豪迈歌声，立即拿起各自的武器紧急集合，准备参加武斗。

当时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据一友人回忆，1976 年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初春》，片中有一群法西斯德国兵在街边饭馆醉醺醺地高唱古典歌曲《美丽的村庄》，在影片公映后，这首歌也在一些地方流传开来，可见当时人们对外国名歌的喜好与渴求，也不管是由什么人唱出来的了。在文革中公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肯定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血色黄昏》，272 页），其实此歌是 50 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从 1970 年开始，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 年 3 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 1975 年柬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 1965 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 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 600 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45—46 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革命

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页）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或改编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除了生活环境的改变外，政治上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因文革前所受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抱有一些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7年底开始，北京陆续有少量中学红卫兵自发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潮流。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中学生）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或改编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

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还有一点与造反派歌曲明显不同的是，越是没有“战斗性”、“革命性”，越是不“红”，越是“灰色”的知青歌曲，越是能够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年“知青”与“红卫兵”大为不同的普遍心态。有些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民国时期流行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如当时成都知青中曾流行过一首按民国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贺绿汀词曲）曲调改写的《蓉城知青之歌》，歌词是：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
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
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
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
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
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
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
只有你的女儿哟，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
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这样与“时代主旋律”不合的灰暗情调，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自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加以追查。这类知青歌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第五中学 66 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 1969 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对家乡的思念：“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这样的文革式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写信告诉了任毅。任毅在接信的当天下午躲在小屋里，果然在同一时间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不予受理，他只好自己写了检查交给公社和县里。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个史无前例），只是因报到江苏省革委会后，不知为什么原因被省革委领导人改判为十年徒刑，才使他免去一死。直到文革结束后，经过艰难的上诉，才于1979年得到平反。（有关此案的详情可见任毅著《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〇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〇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很少再有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 1972 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 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 1967 年武汉“七二〇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微行——杨成武在 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 年版 87 页）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爱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 页）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 1972 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 1974 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很明确：“叛徒林

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新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线”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

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377 页）

1973 年 6 月 10 日，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599 页）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里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2013 年 8 月 18 日修订完成于重庆风江阁

【文摘】

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 ——414 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

孙怒涛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良知的拷问》一书第七章第二十一节。本刊发表时作者略有修订。

414 有一首战歌。围绕着这首战歌，不仅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还把好几位中央首长都牵连进来了。

战歌是在 1967 年“414 串联会”成立后大概 5 月份唱响的。歌词用的是林彪的一段语录，414 自己谱的曲。歌词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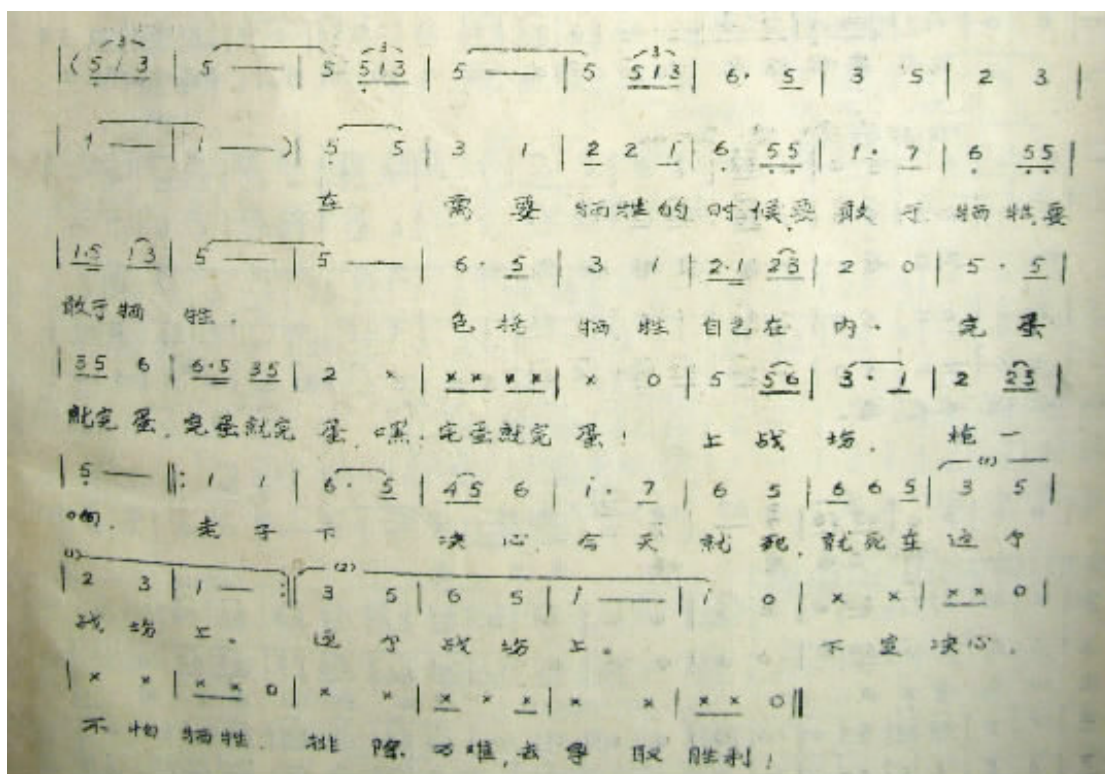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嗨！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楷体字为林彪语录（作歌词时有的词句有重复。最后一句黑体字毛主席语录是呼口号。

说实在的，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对这段歌词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主要是那几句重复的“完蛋就完蛋”，觉得比较粗鲁，有点兵痞气。可能想要表达的也是革命英雄主义，但是总不如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样的毛主席语录来得威武、正气。要让我来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林彪这段语录做414战歌的歌词。

（下图：《414战歌》曲谱，邱心伟提供。）



不过一想到这是林副统帅的语录，我就无语了。想想也是，在战场上，看到自己的战士流血牺牲，杀红了眼，什么糙话都可能会说的，顾不得粗鲁不粗鲁了。

文革初期，流传过毛泽东的好几首未公开发表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里面有一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不雅的甚至可以说是污秽的“屁”字一旦入了领袖的诗文，谁敢说臭？谁敢说不雅？后来这首词公开发表了，报纸上的吹捧文章说那是伟大领袖在抒发豪情满怀的革命情操。中央级的文艺团体在恢弘的舞台上齐声合唱用这首词谱的歌曲，堂而皇之地把“屁”字唱得震天响。

统帅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副统帅的话少说也得一句顶八千句吧？总之，歌词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抒发还是流氓无产者亡命一搏的宣泄，并不取决于歌词本身而是看谁说的。只要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谁敢说半个不字？

开始我觉得不是很顺耳，唱的次数多了，慢慢地就顺耳了，甚至悦耳了。414

集会时唱，游行时唱，广播台更是每天播唱。在派战中，唱这样的战歌就像打了鸡血针似的，特别能鼓舞斗志，激励士气。派性催生派歌，派歌益增派性。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这段林彪语录的。沈如槐、周泉缨的回忆文章里，两人的说法有点出入。不管怎么说，周泉缨很欣赏这段语录，在414战歌形成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泉缨说，选中这段语录是因为它是“一贴良剂”，有助于“克服414派在文革中固有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414派对团派的战斗力。”（《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银河出版社，2006年。116页）

414派中，“东方红战团”对团派向来是观点鲜明、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毫不妥协，已经很“亢奋”了。“温良恭俭让”的弱点是“三七战团”带来的。所以我把周泉缨的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含义就是：414战歌有助于克服414派因为“三七战团”而带来的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414派对团派的派性战斗力。

团派有自己的团歌。第一句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旋律像是颂歌似的，比起414战歌的高亢激昂、杀气腾腾来，反倒显出几分温和味。林彪这段语录透出的“兵痞”气与团派某些人的“民痞”气，倒是很相通的。怪不得团派里有人认为这段林彪语录与团派的气质特别吻合，应该是团派的战歌才是。现在竟然成了414的战歌，阴差阳错，莫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派性是怎样炼成的？派性就是这样炼成的！

团派对这首414战歌恨得咬牙切齿，把它称为“完蛋歌”。414不予理睬，你骂你的街，我唱我的歌。414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也是响彻全校、无孔不入的。夜深时分，战歌一响，老团躲在被窝里直骂娘，老四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好几个月，就这样过来了。

突然有一天，那是1967年的12月5日，团派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称414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414造林副主席的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还说414战歌用的是法西斯语言，宣扬的是武士道精神，曲调是豺狼般的嚎叫。总之，最歹毒的话都说了个遍。

在这之前没有一点征兆，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吓人的罪名。蒯大富有虚张声势的前科，414早就领教过多次了。不理他！414依旧我行我素，战歌照唱不误。

12月13日，蒯大富发表公开讲话，说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要空军司令、林彪的老部下吴法宪核实是不是林彪语录。吴法宪回应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259页）于是蒯说，如果再唱这首完蛋歌，就是明目张胆地炮打林副主席的反革命！蒯大富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密谋，动用了高层大人物的力量来打击414嚣张气焰的这场战役，看来是胸有成竹、胜卷稳操了。

蒯大富的这一番话，打了414一记闷棍。吴法宪言之凿凿而又无法证实的这番话让414陷入极度被动之中。认输不唱是不甘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铁证

来证明 414 战歌的歌词确实是林彪语录。

414 里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纷纷出动，寻找这段语录的权威出处。很快，找到了。414 心里有底了。12 月 16 日，414 广播台发表了一则声明，重申歌词是林副统帅的语录，但没公布语录的出处。414 使了一个欲擒故纵之计，这套虚虚实实的手法是想让蒯大富暴露得更充分些。

学校里的蒯大富还没来得及对 414 的声明做出反应，谢富治、戚本禹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蒯大富助阵撑腰来了。“谢富治说：‘我从未听说过，谣言。’戚本禹说：‘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罪该万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60 页）

至此，起码已有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三位大人物对林彪语录表态，明确站在蒯大富一边了。

414 看时机已到，于 12 月 18 日在大礼堂召开战歌问题专题大会。这次大会由我主持，陈楚三做主题讲话。他在讲话中不仅公开批评了前两天谢富治、戚本禹的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更激动地宣布了 414 战歌歌词所用语录的原始出处。原来它出自林彪 1959 年 11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总参谋部编的《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汇编》。

总部在讨论开这个大会的时候，一致认为由陈楚三来宣布这一证据，比其他任何头头来宣布更有权威性、更可信。

当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老四一听到这一宣布，立时掌声雷动，欢呼雀跃，几乎把大礼堂的圆屋顶都要掀翻了。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沉闷憋屈一扫而光。

团派宣布战歌绝不是林彪语录，犹如一颗“炸弹”炸晕了 414。现在 414 回敬了一颗威力更大的重磅“炸弹”给团派，绝对把团派炸懵了！414 很得意。事态的发展似乎是在这一回合派战中，团派只能悄然认输，偃旗息鼓，而 414 可以大获全胜，得胜回朝了。

还没等到 414 好好地庆贺胜利，品尝胜果呢，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急剧直下。

刚过了一天多，即 12 月 20 日，中午时分，我正在九饭厅吃饭。刚吃了一半，突然，从门外跑进一个姓谢的女同学，找到我，对我说：“老孙，不好了，老团把陈楚三给抓起来了！”

什么？抓了陈楚三？我大吃一惊！张着嘴，含在口里的一口饭堵在喉咙口下不去。我撂下还没吃完的半碗饭，心急火燎地跟着她一溜小跑到 414 广播台。此时科学馆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议论纷纷，吵吵嚷嚷。我知道了陈楚三是在照澜院食堂用餐时被团派用小汽车绑架走的。

在我以往的印象和判断中，团派恨“东方红战团”胜过恨“三七战团”。在“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中，当然对沈如槐最恨。对陈楚三，尽管也很恨，但是我以为在 414 所有头头中，团派最不敢动的就是陈楚三，因为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康生的“养子”。蒯大富即使想动 414 的头头，也绝对不敢动到陈楚三的头头。

为什么要抓陈楚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来的派战中，陈楚三始终坚定地抵抗团派的“旧仇”，再添上前天陈楚三宣布战歌是林彪语录的“新恨”，老蒯对陈楚三真的下手了。这是我的猜测。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蒯大富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非要把陈楚三抓起来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不可。据鲍长康多年后对我说，抓陈楚三这件事并没有在总部会议上讨论研究过。看来，这是蒯大富与保卫组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干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无疑是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

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不仅仅只是蒯大富，还有我。

就在我到达科学馆不久，听得团派广播台广播了将在大礼堂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陈楚三大会的通知。我一听急了，手足无措，方寸大乱。有人说，沈如槐在中央主楼的一间房子里，因怕被团派把他也绑架走，被身边的人劝阻着不让出来。科学馆里只有我和宿长忠两个头头。我与他商量以后，用大喇叭把全校的 414 召集到西大操场。因为事出仓促，来到西大操场的老四都是非建制的散兵游勇。我除了讲陈楚三被团派绑架以外，也讲不出更多可以鼓动的话了。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分派一部分人去大礼堂捣乱团派开大会，一部分人去包围团广播台不让团派专心斗陈楚三。我就这样胡乱地脑袋一拍，调兵遣将。结果，除了造成冲突以外，毫无点滴建树，倒尽显一个书呆子头头在面临突发大事时的笨拙和慌张。

陈楚三被绑架一事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信息：如果蒯大富连陈楚三都敢抓，那么 414 里所有的干部、群众，尤其是 414 头头，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敢抓的，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414 是这样的一个群众组织：像周泉纓引爆的内乱（本刊注：指本书前边讲述的周泉纓所写《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引起的 414 派内部意见分歧）很可能让 414 四分五裂，内讧不断；而蒯大富，甚至是中央文革的横蛮高压只能使得 414 更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这次陈楚三被抓事件对 414 的正面效果是，因《必胜》争吵造成“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之间的巨大裂痕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我想，沈如槐一定也与我一样更明白了，“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精诚团结，减少或者搁置分歧，才能在险恶的大风大浪中让 414 走得更远些，更久些。

陈楚三不只是“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更是 414 的核心头头。在援救陈楚三的问题上，我和“三七战团”没有二话，唯有全力以赴。

冷静下来以后，总部认真研究形势，认为只有上街游行，把事情闹大，让中央知道，才有可能解救陈楚三。

12 月 21 日上午，414 组织了 1500 多人的队伍进城游行，向社会公布战歌事件的真相，诉说陈楚三被抓的冤情，争取輿情的支持，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陈楚三。同时，还质问北京市公安局究竟是谁同意抓了陈楚三。我们想以此惊动更高层领导关注这一事件。“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刘万章说：‘如果陈楚三是反革命，那我们大家都是反革命，我们与陈楚三共存亡。’宿长忠谴责‘蒯大富实行资产

阶级专政，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孙怒涛高呼说：‘还我人生安全！还我‘四大’自由！’”（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66页）

游行队伍在北京市革委会前举行了集会。集会后，在队伍要不要留下来静坐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原来在头天晚上总部核心组开会的时候曾经做过决议：如果上面不立即释放陈楚三，游行队伍就不回校，静坐到底。真到要执行总部决议的时候，不少分部头头及许多骨干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这样孤注一掷的做法是不是策略？学校里的运动还要不要继续搞？已近隆冬，这一千多人的队伍的后勤供应怎么保障？等等。我与汲鹏倾向于先把队伍拉回学校再说。与沈如槐、陈楚三、宿长忠关系极好的张雪梅，出于尽快救出陈楚三的焦急心态，对我这样的“退缩”态度很不满。沈如槐有心想坚持静坐，但从全局考虑，也看到大多数的人不想留下来，决定大部分回校，一小部分留下。因为陈楚三是数力系的又是分管广播台的总部委员，所以自愿留下的三四十名老四也多是数力系或广播台的。他们由总部委员张雪梅和数力系分部一把手周忠荣（当年曾叫周忠东）负责，赶往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来访接待室，办起了“革命到底学习班”，目的是要查清绑架陈楚三真相，要求立即释放陈楚三。

不清楚是不是414声势浩大的游行真的惊动了中央的更高层还是另有原因，反正是才过了几天，事情出乎意外地发生了转机。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生纪念日。那晚，414正在西大饭厅举办“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庆祝晚会。九时许，突然接到中央首长接见的通知。戚本禹、谢富治还有北京市的领导丁国钰、李钟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先单独接见团派，再单独接见414，然后两派一起接见。

在接见414的时候，陈楚三被架着出来，放回到我们中间，意思是说放人了。才几天不见，本来温文尔雅白净斯文的陈楚三，脸上带着伤痕，尽显受尽折磨挨打以后的疲惫。我们立即涌上前去，围着他，如劫后重逢，格外的亲热。

已经知道这段语录是林彪的，已经知道抓陈楚三抓错了，说不定因此还被更高层批评了几句。即便如此，戚本禹张狂的本性丝毫没变。在接见会场，我们与他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他一再狡辩，说：“你们的战歌也是有问题的嘛！曲调不够高昂，也不够严肃……‘完蛋就完蛋’多了么，怎么那么多？……反复也不行。说的严重些，这实际上就是篡改。……起码是不妥当、不严肃。”（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69页）

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战歌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听，我们很受鼓舞，戚本禹问：“你们谁来唱一唱？”我们八位代表再加上陈楚三，蹭的一下全站起来，昂着头挺着胸，齐声唱了起来。尽管我们这几个大小伙子五音不全，但是声音绝对响亮，几乎是对着戚本禹在吼叫，恨不得把他的耳膜震聋！

在同时接见两派的时候，戚本禹不敢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他照本宣科地念了预先准备好书面稿。他不得不承认：“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戚本禹在“但

是”后面又开始大做文章了！他“但是”道：“这个改编没有把林彪同志论述八大作风全部表现出来，同时也没有把林彪同志的我军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作风的话引全，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来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同志伟大的军事著作是不妥当的。此外，战歌的曲调也不够高昂……”（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73页）

看着这毫无自我批评精神、鸡蛋里挑骨头、无理搅三分、满嘴胡喷的戚本禹，我心里极度的厌恶和鄙视。心想，像他这样没有教养连狡辩都没水平的无赖，怎么就混成“中央首长”了呢？

还有可气的是，就在接见会场，团派代表看到陈楚三在场，对着我们大声叫嚷：“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抓起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放出来是实行群众专政！”我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央首长明确表态陈楚三是无罪释放。但是谢富治、戚本禹对我们的抗议置之不理，只说“陈楚三出来了就是了嘛”，绝口不提“无罪释放”。这使我们感到，战歌事件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还留有尾巴。团派只是输了一个回合而已，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2月27日黎明时分，我们回到学校，马上组织欢迎陈楚三胜利归来的群众大会。从南校门直到大礼堂，七千多名老四列队夹道欢迎陈楚三。尤其在大礼堂的过道上，人们簇拥着陈楚三向台上走去。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如欢迎钢铁英雄凯旋归来。对414来说，他们不得不释放陈楚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陈楚三被释放了，本来驻扎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的“革命到底学习班”也可以撤离回校了。可是，释放当天中午，团派有十几名总部委员发表联合声明，说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也发表讲话，说：“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抓就抓，想放就放。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75页）想到陈楚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抓走，又不清不楚地被放回，觉得事情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不，遗患无穷。总部与“革命到底学习班”商量以后决定，一定要为陈楚三讨一个公道，也为414讨个公道，这个学习班还是要坚持办下去。

这以后，“革命到底学习班”由周忠荣负责。

总部委员都到过“革命到底学习班”，我也到那里住过两天。我发现他们与公安局工作人员的关系很不错，彼此能平和相处。这很不简单。因为在北京市一般民众的眼里，既然414是蒯大富的对立面，那414肯定是保守的，不被中央支持的。尤其是公安系统，是谢富治一手把持的地盘。要在公安局门口的接待室里和平申诉，万一有点过激的言语或行为，马上扣个“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帽子，吃不了兜着走。周忠荣他们白天学习、开会、写大字报、找公安局的同志申诉和询问，晚上铺点东西和衣而睡，还有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这二三十位老四都在为陈楚三被抓一事讨个公道做出了极大努力。其中有位姓薛的女教师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令人感动。我对这批“东方红战团”骨干的精诚团结，对周忠荣的奋勇带头和出色能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惊羨不已。陈楚三能有这批生死之交，不枉为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坐了几天无产阶级专

政机关的禁闭。

“革命到底学习班”在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接待室坚守了 95 天。他们要求追究抓人关人的责任人，矛头直指蒯大富、谢富治，同时要求为陈楚三彻底平反。在蒯大富、谢富治大紫大红的时候，这些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1968 年 1 月中，戚本禹倒台。414 上下欢声雷动。这本来是一个顺坡下台的好机会。总部作出决议命他们撤回学校。但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倒谢富治的风潮，他们认为那里是一块很好的宣传阵地，想再看一看，还是不肯撤回。

2 月份，首都高校学习班开张。学习班负责人李钟奇、丁国钰批评 414 至今还有人进驻在北京市公安局里，是破坏大联合的气氛。沈如槐和我这些参加学习班的头头感到压力很重，劝说“革命到底学习班”撤离。他们不听，反把我们这些头头训了一顿，说我们太软弱。连沈如槐都劝不动他们，我的话当然就更没分量了。

到 3 月 24 日，杨、余、傅倒台了，而谢富治反倒岿然不动。他们这才撤回学校。

对于这批“东方红战团”的骨干，我既钦佩他们的执着，也恼火他们有时候的固执。

在 414 头头中，被团派扭送进公安机关的，前有周泉纓，后有陈楚三。因为周泉纓的《炮打》（本刊注：指周泉纓所写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在 414 群众和总部里都是不得人心的，认为他的炮打行为是伤害 414 整体利益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所以，他被扭送进去以后，414 总部并没有对他有营救的举动。相反，在底下里，我听到过说他是自己想当反革命、是咎由自取的议论。陈楚三被团派绑架至公安局，大家一致认为陈楚三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了 414 整体利益而受迫害的。所以 414 上下一气，誓把陈楚三营救出来。对他们俩被抓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了尽管在派性年代，414 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

在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后人看来，战歌事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回头看看，确实是闹剧。414 拿林彪语录当做派歌是闹剧。团派攻击 414 伪造林彪语录是闹剧。414 反击团派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也是闹剧。一段话，要是领袖语录，那谱曲传唱就是热爱领袖的表现，否定这段语录就是恶毒攻击领袖。若不是领袖语录而当作领袖语录，那就是篡改领袖语录，罪该万死。至于这段语录，内容是不是正确、健康、有品位，那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互相攻讦，更是闹剧。如果只是打口水仗，骂来骂去，还只是小闹剧。最后竟然把陈楚三给绑架了，最后公安机关竟然把陈楚三收监了，最后把多名中央要员都牵连了进去，这更是大闹剧。

一场闹剧，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荒诞！

在战歌事件中，可以看到团派和 414 都是派性大发作，很难说得清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但是从团派绑架陈楚三开始，虽然 414 救援陈楚三的行动中有很大的派性考量，但是谁能否认得了这是对蒯大富任意剥夺人身自由（他这时有

没有想起一年多前他被工作组无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对谢富治践踏法纪草菅人命、对戚本禹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正当抗争？

经历战歌事件，我感觉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一点保证，随时都有被抓捕被绑架的危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感到害怕。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很团结的、很强大的组织 414。我只是感到清华的文革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已经没有开展正常辩论的环境和氛围了。现在已经不是看谁讲得更有道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了。

我心里非常希望蒯大富能吸取教训，就此罢手，不再炫耀武力，不再使用武力。但是，良好的愿望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几天以后，清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我强烈怀疑其中很重要的动因就是团派在战歌事件没有捞到好处而心生报复。